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二三期 ——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910d)

【亡灵祭坛】	“我要有个三长两短”——记“牛棚”里的向达	郝 斌
【难忘岁月】	行走在历史的河流	高 华
【往事如烟】	文革期间的大学毕业生分配	石福庆
【文献资料】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 (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史海钩沉】	复原与质疑：再探九·一三	差它岁月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亡灵祭坛】

“我要有个三长两短”——记“牛棚”里的向达

• 郝 斌 •

1966年夏天，北大的校园像开了锅。自校长陆平起，直至各系主任，乃至一些班级主任等大小干部，一夜之间统统变成了“反革命黑帮”，各系的名教授，统统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们被置于烈日之下，任由学生和校外来人辱骂批斗。校园钟声从此常歇不鸣，斗争会上的口号声声相连。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藉由北大一块学术殿堂向全国推开，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聂元梓的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播出，即1966年6月1日以后，北大历史系就有系主任翦伯赞等9人被批斗（1），上面急忙派来了“工作组”代行管理职权，局面得有一些控制。到7月下旬，毛泽东说“工作组”实施的是“白色恐怖”，此言一出，“工作组”懵懵懂懂，卷铺盖走人。这时候，历史系又揪出18个人（2）。两年之后，即1968年，再深挖出吕遵谔等5人（3）。历史系的“牛鬼蛇神”，总数达到了32人。那几年，历史系（包括现在的考古文博学院，当时尚在历史系内）在册的教职工总数大约稳定在100人上下（4）。揪出来的人，接近三分之一。

各系的“牛鬼蛇神”，常被赶到校园的空阔地带，或是扫地，或是拔草，实际上，这里成了一个开放式的展览台和批斗场。当时的校外来人如同潮涌，据北大校文革的机关报《新北大》报导，自7月29日至8月22日，一个月之内，校外参观者多达212万人次〔5〕，平均每天8万余人。我们被斗的，每人胸前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黑帮分子某某某”，老远就把参观的人群引来，团团围住。那时候，历史系的办公室还在三院。这是一座庭院式的建筑，两层小楼，红柱青砖。从对开的朱漆大门走到小楼，是一条仅容两人并行的水泥小径，上面长有青苔，十分幽静。此时，三院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一张又一张，有的前一张未干，后一张又糊了上去，就中以用红笔打了叉的翦伯赞三个字最多。倒是爬在墙上的长青藤还透出一丝往日的情趣。可惜，这个时候，还有谁去理会它呢。

一天，历史系的“牛鬼蛇神”24人，被叫到三院历史系文革办公室。一阵照例的训斥之后，学生押着我们去校园劳动，还没有走出大门，就被迎面涌来的串连人群堵了回来。人越集越多，墙头上都站上了人。人流继续涌过来，我们原来排成的行进队形早被打乱，压缩成了一团。说起来，这群“牛鬼蛇神”，此时此地，居然不忘患难相扶之义，先把我们中间唯一的女性陈芳芝围在中间，又努力把年长的向达、体弱的杨人便（木旁）和邵循正挡在后面，甚至连周一良先生也奋勇向前，左抵右挡。四十多年以后，年近八旬的夏应元先生同我一起回忆“牛棚”往事，当说到三院被围这段，他突然嗓音放高了许多，慷慨之情溢于言表。读者朋友您不知道，我们被斗一个多月了，整天都是晦气，哪有什么豪气？整天都在做鬼，哪能做人？那天三院的患难相扶，倒让我们个个豪气填膺，不仅找到了做人的感觉，而且感觉至深。有道是敝帚尚且自珍，我们平庸的一生，能有这么一回，也算是轰烈一场。晚年回忆起来，足可以自安自慰，您说，谁能够淡然忘怀呢！

还说当时的三院。院子里，这个时候已经是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之间，没有任何空间、也就是没有人身界限的尴尬场面。连我们本该弯下来的腰，也早被挤得直起来了。人群中突然有人喊道：“让他们站到上面去！”三院的二楼有个阳台，座西朝东，也算宽敞。其实，这时的阳台早已被腿快的人占满了。不过，经这一喊，人群中真的分出一条道来。我们踉踉跄跄，被推上阳台，一字排开，挨个向台下交代自己的姓名、出身、头上有什么“帽子”等等。阳台上下也都安静下来。其时，约在1966年8月下旬，正是在毛泽东8月18日检阅红卫兵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手扶栏杆、面向小将的大幅照片，随处可见。台下的青少年们，可能有他们那个年代特有的敏感，一见我们站在高处，身前还有一道水泥栏杆，他们却要仰头观看，大概就联想起“八·一八”的大检阅来。这时候，阳台下又有人高喊：“不行！他们像是检阅！让他们站到外边来！”栏杆的高度接近一米，可栏杆之外，只有一条宽约70公分的排水沟，中间凹下去，还铺着碎石子。我们无奈，只好跨出栏杆，站到外面。我的脚尖距离阳台的边缘，大约只有十几公分的样子。不想，台下人又喊：“跪下，全都跪下！”到了这个时候，从院子里的推推搡搡，拉上阳台挨个斗过一遍，已近一个小时了。烈日之下，人人头晕脑胀。我暗自提醒自己，这里只有一膝之地，跪下来，无论如何要控制住平衡，要是一头栽下去，虽说不是很高，也难免残废。那一年，我32岁，尚有如此之惧，向达先生66岁了，杨人便（木旁）、商鸿逵也60岁开外了，他们能撑得住么？真是万幸，我们都撑到了曲终人散。不过，批斗会结束，看押我们的学生喝令我们出去劳动时，向达、杨人便（木旁）却仍然跪着不动，原来，他们一时竟站不起来了。

这是我们文革中遭遇到的“第一跪”。细说起来，控制平衡不栽下去，还算容易；精神和人格上能够承受住这种羞辱和压力，才是难关。西语系的教授俞大因（丝旁），英国语言文学家，平日教学严谨，要求学生准确之中求熟练，十分受人尊敬。在我们之前几天，她被迫当众下跪。出身名门、精神优雅的俞先生，视尊严重于生命。这个世界如此对待她，那还留恋什么？回到家里，她便从容、尊严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消息，刚传到我们的耳朵、还在心头震荡的时

候，不想我们也遭遇同一命运。最让人担心的是向达先生，他脾气倔，受得了这份屈辱么？第二天集合的时候，不想真是缺了他——还好，他是最后到来的一个。站在队里的我们，互递一个眼神，替他庆幸。后来，我冒出一个想法，多亏那天是齐齐唰唰的一排，跪满了三院的阳台。屈辱、压力虽大，可“牛鬼蛇神”的人数也颇众多。力学上有一条定理：底面积越大，单位面积的压力越小，两者成一反比。这就是“独跪”与“众跪”的差别之所在吧！那天，假如是向达先生一个人当众“独跪”，他还受得了么？您别说，这一跪，对我们的日后，也有某种预热的作用。毛主席教导红卫兵小将：“到大风大浪里去游泳。”其实，我们也是如此，只是所扮演的角色不同罢了。

连下了几天雨，我们改去打扫楼道和厕所。在楼道里干活，有个遮挡，不再暴露于外来串联的人群之前，可以免去他们的追逐和辱骂。可是，走在楼道里，磕头碰脑的，全是同事和熟人，受辱的感觉更甚于陌生人前拔草，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那几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生呢？他们碰到的全是自己的学生和晚辈，此情此景更何以堪！有人进了厕所，见我们在那儿干活，扭头出去，另找地方了；也有人情急，或属豁达之士，能够放得开、便得出，那就是我们干我们的，他干他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没有几天，小便槽里多年积垢的尿碱，一层又一层，让我们刮了个干净，露出了多年不见的水泥本色。可是，向达先生，还有邓广铭先生，他们两位的脸上，却像挂了一层厚厚的霜。说起来，倒是商鸿逵先生尚能坦荡对待——这固然是商先生的豁朗和涵养，可您知道吗，早在1952年，他的头上，就有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算来，他磨练十多年了，多年的逆来顺受，想不到却有今朝之用！

一天上午，我们正在文史楼打扫楼道，忽然一声喝吼，来了两个学生，把我们集合在一个房间里。“向达！”其中一个喊道：“你竟敢仇视伟大领袖毛主席，真是反动透顶！”向达教授被打入“牛棚”，因为他是“反动权威”和“右派”，这是尽人皆知的老账和明账。对领袖有什么不恭，可从来没听说过。不过，一听到“领袖”二字，我的神经先绷起来，因为我头上的罪名正是“反对伟大领袖”。当时的批斗，常用一种代数学上的“同类项可以合并”的办法，能一锅煮的，全都放进去。向先生有罪，按律如何，我也就难免。此时的我，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

一个学生说：“向达！我们刚刚对你的狗窝采取了革命行动，铁证如山，你要老实交代！”——所谓“革命行动”，那就是向先生的住宅燕南园50号被抄了。听口气，像是抄出了什么犯禁的东西。这种喝问接连几次，但见向先生的脸上全是茫然和无奈。他回答不出什么，也分辨不了什么。一个学生开了口：“你的茶几上是不是有毛主席瓷像？”向先生答：“有。”“对面桌上有什么？”向先生答有闹钟、茶壶之类。两个学生很光火，大喝：“不老实！”僵持了好一阵，最后还是学生说：“对面桌上有一只老虎，张开大嘴，冲着毛主席！向达，你真是费尽心机，发泄你对伟大领袖的仇恨！”

听到这儿明白了：那只老虎该是一件工艺品。向先生没再作申辩。事情怎么了结呢？这时，学生看到墙上有一张毛泽东的“标准像”，就喝令向先生在像前下跪“认罪”，向先生也照办了。这是他第二次屈膝。

向达是什么人呢？他的身世和学问此处不论（6），只谈一件事即足可见其品德为人。1946年的平安夜，驻北平的两个美国大兵强暴了北京大学先修班的女学生沈崇，沙滩红楼贴出抗议美军的大字报，号召学生抗暴游行。12月30日，不知几个什么人，去撕扯红楼大钟上贴的罢课标语，正被向达先生撞见。向先生一人面对几个，竟然走上前去，怒斥他们：“你们有道理，也写大字报贴出来！撕人家的不是本事！”短短几句，义正词严，声震楼宇。那几个人对向先生推推搡搡，这一下更惹恼了他。向达认为，大学的校园里竟有这种侵犯人身的事情发生，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向校长胡适提出辞职，一时间有多少学生社团和教授出来安慰他、挽留他。学生的抗暴游行过后，北平警察当局实行“户口大检查”，夜入民宅，捕去无辜市民多人，

向达先生又同12位教授一起签名〔7〕，发表《保障人权宣言》。向先生的名字因此被当局列入黑名单中，他却全然不当一回事——这就是当年的向达！可现在呢？我们看到的向先生，他无言，没有分辨，没有反抗，只见他双膝屈倒，跪在毛泽东像前，按照学生的命令，一字不差地称：“我有罪！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

今天说起这段往事，您也许会问，是这两个学生智力低下吗？是他们无理取闹吗？我可以断然回答：都不是。任何一个人，包括我们、包括向达先生，凡是亲临其境的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是在按照自己的认知行事，很有一股堂堂乎正义之气。对当时的大局，我们人人都有困惑和迷惘，百思不得其解，而面对这两个青年学生，对他们的作为，我们却只能做出这样的判断。我们深知，这不是个人行为。在他们的背后，站着全校的学生，乃至千百万同龄的青少年。小孩子缺乏识别能力，本属与生俱来的欠缺，关键在大人如何对待和引导。可在那个年代，当愚昧与真诚并于一身，非理性的温床已经形成之际，偏有那么一些人，偏有那么一些以为“民心可用”的权术之士，从中操纵、运用。这种人，大至国家高层，小至某个学校、工厂、幼儿园，几乎个个单位都有。您想，这还能有个好么？他们的推波助澜，成就了“伟大战略部署”的实施。于是，社会瘟疫流行，害得整整一代青少年染上了恣意追求情绪和暴力的群体性症候。

此时的觉明先生，已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他历经清末、北洋、民国、共和国几个历史时代，还当过一回“右派分子”；他到过英国、德国和法国，什么没有见识过呢？说他走过的桥比那两个学生走过的路还多，恐怕也不为过吧！还有，向先生是个很有脾气的人，说话行事，一身湖南人性格。1948年，北大校长胡适，在办公室正同几位教授聊天，时任历史系教授的向达走进来，当面提出质问：“胡先生，您把北大所有的图书经费，用去买《水经注》。我们教书的几乎没有新材料作研究工作，学生无新教科书可读。请问，这是正当的办法么？”〔8〕他的表情相当严厉。刚从美国回来讲学的邓嗣禹教授当时在座，邓在他的回忆录里说，他“一看形势不免有一番舌战”〔9〕，连忙起身告辞。向达的质问并非过分，就是胡适也承认：“《水经注》大典本（后半部），北大买价为九百六十万元法币，说来真有点骇人听闻。”〔10〕

说到这里，您不免要问，见识、阅历和性格如此的向达先生，在两个学生面前，没有半句的辩白，就屈膝称罪，该作如何的解读呢？朋友！这真是一个难题。四十年前，事起突然，懵懵懂懂，四十年后的今天呢？四十年后的今天，好像没有明晰多少，依然如同隔雾看花。

话说1966年的国庆节快到了，我们心里升起一线希望：如果监管学生也放几天假，我们就能喘口气了。

9月27日上午，正在校园里劳动，历史系文革来了通知：两个小时以后，各带行李和“毛选”，原地集合，不得有误！

时届深秋，衣物不能少带，可背着行李走路，又不好多带，真是左右为难。住在集体宿舍的我们几个年轻教师，很快打点完毕，到达集合地点的时候，看见向先生已经先于我们而至。接着几位老先生的家属，也用自行车，一个一个推着行李陆续到来。邓广铭先生家住朗润园，比杨人便（木旁）先生住的燕东园、邵循正先生住的中关园，都近许多，可独独不见他的影子。直到监管的学生发急了，他才姗姗出现。我们“黑帮”一伙，两个月来，整天苦脸相对，哪曾有过笑容？这个时候，一见邓先生的样子，都有点忍俊不禁。原来邓先生带的是一床鸭绒被，捆打的时候，没有挤压出空气，好大一个团团，他老人家头顶肩扛而来，绳子渐松，鸭绒膨起，里面裹的衣服也快掉出来了。邓先生身躯伟硕，此时虽是凉秋，头上已经冒出汗来。监管学生见此情状，破口大骂。我们试着凑上去，重新捆绑一回。鸭绒被不同于棉被，压住一头，膨起一头，两个人四只手，捆绑起来也很费力气。

我们排成一行，随即上路，前后有人押着。出了东校门，来到京包铁路线上的清华园站，登上北去的火车。在车上，我们面面相觑，此行何去？这真叫做前途未卜！当火车停在南口站时，我们被喝令下车。出了站台往东一走，大概是徐天新首先作出判断：“是去太平庄！”就像夜行军中小声传递口令一样，没走多远，除去耳背的向达、杨人便（木旁）和杨济安，大概都知道要去哪儿了，我们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太平庄”，在明十三陵的定陵北面，两者相距五、六公里。这里原是昌平县绿化大队新辟的一个林场，砖房几十间，坡地八、九块，分布在几个山头上。附近有一个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落，名叫太平庄。当年绿化大队初到，这里荒芜一片，没有地名，也就随它叫了“太平庄”。

此前一年——1965年，历史系按照上面的意思搞半工半读试验，昌平县把这个林场连房带地，交给了北大。历史系一、二年级（64级、65级）的学生来到这里，兴致勃勃，像是走出了象牙之塔。在太平庄的开学典礼上，北京市委主管文教的书记邓拓曾来出席，还讲了话，表示市委很关注这个试验的成败云云。没有几天，他用“马南村”的笔名在《北京晚报》上连载的杂文《燕山夜话》，被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批判文章越来越多，标题的字号越来越大。学生们坐不住了。“太平庄”是一家“黑点”的流言不胫而走。几位班主任深入学生宿舍多方解释，还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彭佩云，时在北京市委大学科学部任职，时常往来于市委与太平庄之间，一住十天、八天，也是常事。等到1966年6月1日，聂元梓的大字报反复播出，彭佩云的大名反复出现，学生们听了，当夜就打起行李，坐了一夜，争论了一宿。次日清晨，汽车一到，二百名学生如同提开闸门的洪水，直从太平庄头涌泄下来，脱离“黑点”，一口气奔回北大。太平庄只留下两、三个人看守。

我们到达了太平庄，那儿的一切都是现成的。我们住进可容24个人的大房间。学生原来睡的是上下两层床，我们年轻的，自动把行李放到上铺，下铺留给向达、杨人便（木旁）、商鸿逵、邓广铭、邵循正、周一良、阎文儒、宿白等年长的人。由此，开始了第一期六个月的集中营生活。不过，向先生在这里只住了一个月。

次日宣布了作息制度和管理制度。起床盥漱之后，“天天读”一个小时，而后早饭；上、下午各劳动四个小时；晚饭后，学习“毛选”，写交代材料。只有星期天的下午免除劳动，可以洗洗衣服、相互理发，或到附近村里的小卖部买邮票、发信。在这里监管我们的学生，多的时候三、四个，少的时候只有一个；另有因神经衰弱、睡眠不好，遵医嘱在这里疗养的两个学生。这样一来，太平庄上就成了牛鬼蛇神“十万户”、革命群众“两三家”的局面。不用说，像北大校园那样整天的追逐、围斗，就幸免了，可监管的学生又想出了新招儿。

我们一日三餐，餐前要在毛主席像前列队，弯腰低头，背诵“语录”，而后齐声一喊：“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接着，一个、一个分别报出自己的姓名，但在姓名之前，要加上自己的“帽子”。我的帽子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向先生有两项：“反动学术权威”和“大右派”。周一良先生，起初是两项，后来给他加到了五项。这种规定让我们受辱难堪不说，一个上午的活儿干下来，正等两个窝头进口，可还没有吃，就先来一通“请罪”，真是让人恶心欲呕，眼前摆着窝头也不想吃了。不过，肠胃很有适应能力，这种感觉，两三天后，渐渐地淡下来。我们顿顿“请罪”如仪，顿顿窝头照吃。

学习“毛选”，互讲“认罪”的心得，也算是一招儿，时不时的就来一次。一天上午，太阳出来暖洋洋，监管学生高海林让我们围坐在屋前背风的地方，座谈“认罪”心得，几只小鸟还在身边跳来跳去。可在这种场合，不开口不行，开口，也只能说“我有罪”、“我要脱胎换骨”之类的话，无非是身体受过折磨之后，还要让你从心理上再自戕自虐。每逢这种场合，人人都

求靠后，不愿争先。不想刚到太平庄，向先生就抢先发言。他说：“我这次出来，跟老伴交代过了，我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就搬到燕生那儿去。所以，我到了这里，没有什么牵挂，能跟大家一块儿安心学习。”向先生说到这里，高海林跳了起来，喝令向先生站起来、低头弯腰，大骂他“反攻倒算！”

向先生说的燕生，是他的儿子向燕生。他嘱老伴万不得已之时，惊吓老病之身能有个安顿，应是肺腑伤恻之言。向先生何以要在这个场合重复这番话，笔者当时三十出头，年轻力壮，听了也就过去了，并未深加理会，直到后续的事情发生了，才把他当时的那一番话语，陡地回想起来，出了一身冷汗。

炊事员崔师傅待我们不错。只要我们下工的时候，能从山上捎带回足够的柴禾、树枝，他就会隔个两、三天烧一锅热水，让我们睡前烫烫脚。可打洗脚水，要从我们住的河滩，爬上一个小山坡，才能到伙房。黑灯瞎火，顶着北风，热水端回宿舍，也变成了温水。我常常一懒，就免了，躺进被窝慢慢地温被子。这个时候，我看到阎文儒，拿起向达的脸盆，给他打回热水，放在面前，然后再拿起自己的脸盆去打水。向先生洗完脚，阎文儒还是一声不响，端起水盆，走出房间，把水泼到老远的河滩。碰到监管学生进屋巡视，他就作罢。后来，阎先生不只打水、倒水，还给向先生脱鞋、脱袜子、穿鞋、穿袜子。向先生平时就是一脸的严肃，很少表情，这个时候，阎先生伺候他，他好像也都当得、受得，安之若素。我在一旁看了，有点诧异，邓先生向我努嘴示意。我从床上往下一看，见向先生的双脚肿起来了，肿得很厉害。第二天在山坡上，得便的时候，邓先生又悄悄告诉我：“这不好！‘男怕穿靴，女怕戴冠’，他怕是穿靴了！”邓先生说这话的时候，脸色比向先生的还严峻。“穿靴、戴冠”，这是生活经验的概括，我第一次从邓先生口中学来。又过了两天，午饭前列队“请罪”的时候，不见了向先生；回到宿舍，却见有他的行李和用具。听人说，准许他回学校看病去了。

转过年，1967年3月，包括我在内的5个人，最后一批被允许回到学校劳动，太平庄没有历史系的人了。我们把向先生的行李一起带回，交到历史系文革办公室。不久，慢慢的听说，向先生被诊断为尿毒症，入院的时候已成不治之势，医生也无力挽回了。1966年11月24日，向先生离开了这个吵吵嚷嚷的世界。还是听说来的，先生的丧事草草——那个年月，“黑帮”死了，谁敢哭出声来！

话说回来，阎文儒何以侍奉向达先生如此，如同至亲一般？这应当是一段师生的情义。

1939年，设在西南联合大学之内的北大文科研究所，第一次单独招生。史学组录取了三名学生，阎文儒是其中的一个。向达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也是文科研究所史学组三位导师中的一位。阎文儒就是向达指导的研究生。1942—1944年，向先生两次参加中央研究院西北考察团，担任历史考古组长。他赏识阎文儒的诚朴好学，推荐他加入考察团。阎文儒在考察团的一年半时间里，先后参加了民勤、武威、张掖的古墓发掘。距我给您诉说的阎文儒为向达端水洗脚的时刻，二十多年过去了，向先生66岁，阎文儒54岁，都是半百以上的老人了。笔者不才，我是关在“牛棚”里，才学到“一日为师”这一课的。

我所知道的向达先生，平日说话行事，了无情趣，讲起课来也是干干巴巴。我毕业的第二年，在32路（现在的332路）公车上远远看到他，赶紧多买了一张票。下车之前，挤到他面前，举起手里的两张票，不料他说：“我有月票！”脸上没什么表情。下车之后，我赶紧告别，自觉没趣不说，心里可惜的还有那一毛五分钱！我同向先生是隔了两辈的人，总是从远距离看他，他也总是那么冷冷的。倒是在“牛棚”里，阎文儒先生的行动间接而实在地告诉我，向达先生自有他的人格魅力，这一点让我至今服膺不疑！

注释：

〔1〕另8人是：许师谦、周一良、徐华民、汪钱（竹头）、徐天新、吴代封、范达仁、俞伟超。此外，还有当时在历史系协助工作的张胜宏（党委研究室）也被批斗。

〔2〕这18人是：向达、杨人便（木旁）、邓广铭、邵循正、陈芳芝、商鸿逵、阎文儒、宿白、荣天琳、陈仲夫、田余庆、高望之、杨济安、张注洪、李开物、夏应元、孙机、郝斌。

〔3〕另4人是：罗荣渠、谢有实、李原和吴维能。

〔4〕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简史》（初稿）。

〔5〕见《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764页，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

〔6〕向达于1955年被首批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委员。当时的学部委员，相当于现在的科学院院士。

〔7〕另12人是：陈寅恪、汤用彤、徐炳昶、朱自清、俞平伯、张奚若、金岳霖、吴之椿、钱端升、陈达、许德珩、杨人便（木旁）。

〔8〕邓嗣禹：《北大舌耕回忆录》，见《传记文学》第46卷第一期。亦见《我与北大》，541页。

〔9〕同上。

〔10〕见《胡适书信集》中卷，第1085页，耿云志、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 原载《万象》2009年第6期

~~~~~

【难忘岁月】

## 行走在历史的河流

• 高 华 •

我的论文集《在历史的“风陵渡”口》出版在即，时代国际出版公司的编辑来电嘱我为这本集子写一篇序言，读着手上的校稿，既有几许欣慰，也不乏一丝苦涩之味，不由得想起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思绪一下从现在又跳回到过去，于是拉拉杂杂写下这篇文章，权当“立此存照”吧。

如果说从进入大学的历史系就算正式学习或研究历史，我在史学领域已呆了二十多年，也在南京大学渡过了自己从青年到中年的人生岁月。我和南京大学最初的渊源，是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结下的，却是和大学原来的意义没有任何关系。我虽然从小就对大学充满向往，很早就读过苏联作家特里方诺夫的《一年级大学生》，但很清楚读大学那是遥不可及的梦，文革前我就知道家庭成份不好，成绩再好也考不上大学。在文革的最初几年，一些著名大学都成了所在地区政治运动的“风暴眼”，它的大门向一切人敞开，文革爆发时，我是六年级的小学生，小学的正常教学已难以为继，我就经常一人去离家不远的南京大学看大字报。1966年10月，我在南大北园第一次看到来宁“串联”的“首都三司”红卫兵张贴的批评刘少奇的大字报。那时文革已进入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阶段，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其中有一张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勒令狗崽子”：“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自那以后，南大陪伴我从少年走到青年，又走到中年。

我的父母都不是知识分子，父亲因家贫，十二岁就在电镀厂做童工，被累得大吐血，是靠着做伙夫舅舅的抚养，才读了小学和陆续读完初中。父亲爱看书，最爱读的就是历史书籍，诸

如蔡东藩多卷本的《中国历朝演义》。可能受他的影响，我在文革前的小学阶段就读了《红旗飘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氓》、《三家巷》、《林海雪原》等等那个年代流行的革命书籍，也喜欢读《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五四以来老作家的作品。一个同学家的书橱里有一本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令我羡慕不已。

喜欢读书，加上自己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很自然地就对学者受难有一份很深的同情，在南京大学北园“文革楼”（文革结束后恢复原名“教学楼”）的阶梯教室里，我亲眼看到南大地理系主任任美镠教授被批斗，也看到“文革楼”底层橱窗里张贴的匡亚明校长手写的“认罪书”和挂着牌子在校园低头扫地的“反动学术权威”。

因为父亲是“右派”，我被禁止参加庆祝国庆17周年的全市小学生游行队伍，我也没能参加1966年的“大串联”，但是心里总有不干，也想“经风雨，见世面”。1967年4月底的一个夜晚，我和两个同学跑到南京的下关火车站的车场，爬上一辆敞篷货车去上海，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去上海。我们担心到了上海后出不了车站，第二天上午就从南翔站下了货车。在那儿我和两个小伙伴分手，他们在上海都有亲戚，我一人再坐车直奔南京路，要去亲眼看看在书本上早就熟悉的这条有名的街道和当时中国最高的建筑——24层楼高的“国际饭店”。那一天，我一直在南京路和外滩游荡，在外滩大楼的墙壁上，我看到了“炮轰韩先楚”的大标语，晚上我花了几角钱找一家浴室住下。两天后，我又一个人回到南翔，天空下着雨，沿着铁轨走了很远，在一个青年铁路工人的指引下，爬上一辆将要开往南京的货车，躲在蓬布里，回到了南京。短短几天的“经风雨，见世面”，锻炼了我的毅力和勇气。

成长在文革动荡的岁月，作为“黑五类”子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饱受白眼和歧视，高尔基的《在人间》和《我的大学》成了我精神上的向导，南京大学就是我少年时代的“大学”，我在那儿不仅看了无数的大字报，还见识了许多“新事物”。有一次我游逛到北园的一排简易平房，发现里面住着一群来自安徽凤阳的农民，男女老少都有，他们都持有所在公社大队为他们提供的证明，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然后是几句话：某某某是贫下中农，因遭自然灾害，外出要饭，请予帮助！

在那个年代，我生活在一个由旧书本构成的虚幻的世界中，虽然都是杂乱无章的读书，却渴望灵魂的自由。1966年深秋，我读了一本鲁迅的集子，里面收有《无声的中国》，惊奇鲁迅几十年前的话还是那么有现实性。一本《中国分省地图集》和一本《读报手册》几乎被我翻烂了。我的一个同学的父亲是“挑高笋”的（南京话，即“收废品”的），我经常去他家翻看他父亲收购来的《参考消息》和《旅行家》等旧书刊。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共产理想主义仍然焕发着强烈的思想魅力，1967年的秋的一天，在我家隔壁的南京市某汽车配件公司，我很偶然的看到一份《参考消息》，知道了格瓦拉在遥远的玻利维亚被捕遇害的消息，也知道了中国不喜欢他的“游击中心主义”，但心中仍充满对格瓦拉的崇敬。就在我读《讨瞿战报》上刊载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的同时，《瞿秋白文集》中的那首《赤潮曲》我已能一字不拉的全部背下，至今仍未忘记：

赤潮澎湃，晓霞飞涌，  
惊醒了五千余年的沉梦。  
远东古国，四万万同胞，  
同声歌颂神圣的劳动。  
猛攻，猛攻，  
捶碎这帝国主义万恶丛！  
奋勇，奋勇，



解放我殖民世界之劳工！  
无论黑白黄，无复奴隶种，  
从今后，福音遍天下，  
文明只待共产大同。  
看，光华万丈涌！

七十年代初，我家搬到更差的房子，但是对于我而言，这间狭小、阴冷、潮湿的住房却透着光亮，因为被搬到农村去的南京市某重点中学被封存图书的留守处就离我的家不到十米，我的身边竟有这样的宝库，让我兴奋不已！我通过看管图书的老先生，读了大量的中外著作，特别是俄苏文学的作品。那些理想主义的英雄和共产革命的先驱：拉赫美托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怎么办》中的主人公）、约翰·克里斯多夫、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李大钊、恽代英、刘伯坚、季米特洛夫、台尔曼、伊巴露丽，好像是一座座灯塔，在我心头闪烁。说来非常矛盾，那时的我一方面愤怒于沙俄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和斯大林对中国的霸权行径，另一方面，又把“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已逝去的“中苏友好”的岁月联系在一起。1969年9月胡志明逝世的时候，我正在读瞿秋白的《饿乡记程》和《赤都心史》，看到胡主席遗嘱中针对中苏分裂所写的那些沉痛的话，非常感动，甚至内心里渴望重新回到“中苏友好”的年代。

那时，有关苏联的消息，内容极为单一。

1969年底，中国半公开大量发行了一本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书籍，这就是几个日本留苏学生写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作者站在同情、拥护中国文革的角度，披露了一些苏联的现状，我就是从这本书知道了在莫斯科还有一所专门吸收亚、非、拉国家学生的“卢蒙巴各族人民友好大学”。在文革初、中期，只能从蛛丝马迹中捕获更多一点苏联的信息，当时从正面的角度少量披露苏联和东欧情况的只有一个报刊，这就是由越南华侨协会主办的中文周报《新越华报》，上面偶尔会刊载一些有关苏、越关系，越南和东欧、古巴关系的报道，我每周都会去市外文书店买一份《新越华报》，有时也会买一份《朝鲜》画报，只因为那时的《朝鲜》画报偶尔也会有一些有关苏朝关系的内容。

然而书本终究不能代替现实，我活在当下，这是一个坚硬无比的现实世界，随处都见到赤裸裸的暴力和恐怖。1966年9月，我亲眼目睹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的红卫兵，押解着南京市近千名被泼了满脸墨水，赤着脚的“牛鬼蛇神”在全市进行大游街。在我家附近的街角口，有一个合作食堂的流动点，一对山东老夫妇每天早晨出摊卖煎饼裹油条，有一天我发现，正在摊面做煎饼的老汉的衣服的前襟上被缝上一块白长条，上面写着“国民党兵痞”。

我从小就生活在南京，这儿的一砖一石，山山水水，都渗透着浓郁的历史沧桑感。我的一个小学同学的父亲是二十年代的共产党员，我和他家也是邻居，老人的经历非常丰富，也喜欢看书，他是黄埔六期的学生，参加过北伐，大革命失败后做过中共苏南某县的县委书记，三十年代初和恽代英同在中共上海法南区委从事地下工作。老人认识许多著名的中共领袖人物，被国民党逮捕后进入苏州反省院，出来后脱党，四十年代后期又回到革命队伍，五十年代因“潘杨事件”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林彪事件”发生后，老人被几个军人带去北京审查一年多，要他交待和一些重要人物的关系。老人从北京回来后，我去看望他，老人说，有关人员一再要他谈康生的历史和对康生的看法，他因知道康生的厉害，始终都没吐一字，所以才能平安回来。在那些年，我每隔几天都会去和老人聊天，山南海北听他聊中共早期的历史，“顾顺章事件”和“海棠村事件”就是他最先告诉我的。

然而我的生活却和“历史研究”无关，和任何“学术”无关。1970年我初中毕业，当时领导江苏的那位著名的军人司令员一声令下，南京市这一年毕业的初中生全部留城，分配到

急需人手的工矿企业，这样从16岁半起，我就成了一个工人。1971年后，大学重新恢复招生，在南京的街头上经常可以看到戴着校徽的“工农兵学员”，可我知道，自己和他们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我虽然已工作，但读书却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可以说这是我几十年中读书最认真，最勤勉，最有心得的阶段。1971年林彪事件客观上大大推动了国人思想的“脱魅”，但给我的思想震动却不是太大，此前，我就已对社会的主流意识多有怀疑，特别是在中共九大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林彪的部下大量进入政治局，军队影响遍及社会各个角落，我记得父亲说了一句话：“物极必反”。在我的单位传达批判《571工程纪要》时，有一个同事，他是1963年的高中毕业生，因家庭问题而未被大学录取，他就以半调侃的态度说：林秃子恶毒啊，竟然污蔑伟大领袖是B-52轰炸机，还攻击我们是“封建社会主义”，真是死有余辜啊！当他说完这番话后，不少同事竞相视一笑，没有任何愤怒情绪，而是皮里阳秋地说：林秃子没有良心啊！是白脸奸臣啊！反革命啊！大坏蛋啊！这一幕给我留下的印象终身难忘。以现在的眼光看，当年向全民公开《571工程纪要》是大大失算了，作出这个决策，显然太过于自信，也太看低了国人的智力。1973年后为“评法批儒”，居然毫无掩饰地鼓吹法家学说，在我细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商君书》、《韩非子》等一批法家著作后，已清楚认识到被包裹在革命词藻下的那个年代主流意识的新专制主义的本质。

在七十年代初中期，上海出版的几份重要刊物，从《摘译》，到《学习与批判》、《朝霞》，我基本每期都看，在这几份刊物中，内部发行的《摘译》最具信息量，成为我了解外邦思潮的重要窗口。那时内部已有许多关于苏联东欧国家的出版物，即所谓“灰皮书”，我对这些出版物特别有兴趣，总是觉得中苏两国有许多相似性。我不仅读过苏联官方理论家阐释“发达社会主义”的论著，还认真读了重点叙述斯大林死后苏共领导层的内部斗争，由北京三联书店编辑的《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记事（1953—1973）》，甚至还读过枯燥乏味的《苏斯洛夫言论选》和金日成著作集。我非常怀念原江苏省歌舞团资料室可敬的凌老师，我读过的许多“灰皮书”的都是她借给我的。在那些年读过的书籍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和《赫鲁晓夫回忆录》。我甚至读过克拉夫钦科的《我选择了自由》，这是一本四十年代后期上海翻译的老书，作者是叛逃到美国的苏联赴美外贸采购团成员，书中披露了斯大林大清洗的内幕，当时震动了西方世界。我因为早读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一位锡兰共产党员写的《斯大林主义》和《赫鲁晓夫回忆录》等书籍，也读过五十年代曾到过中国访问，受到刘少奇接见的苏联女作家凯特林斯卡娅那本描写共青团员们如何战胜“托匪暗害份子”的破坏活动，在远东的大森林中建设共青城的著名小说《勇敢》，已有了不少苏联历史的“底子”，读这本书时反而没有太多的震动。

追求自由的灵魂，但生活在“阶级斗争”的声浪不断升腾喧嚣的严峻的世界里，思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交融在一起，生命反而张显出张力，1971年以后，国内形势有所变化，一些在文革初期关闭的图书馆又局部开放了，我在单位开了一份介绍信，在图书馆办了一个集体借书证。当年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阶级斗争的警惕性非常高，我借的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一类书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觉得一个工人，就应该联系本职工作而读书，所以他们不久就打电话给我的单位，说这个人好像有点什么问题。我单位的老书记为此还专门找我谈话，她说你应该多读《毛选》，多读马列著作等等，其实《毛选》我早就通读过许多遍，《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等我也都读过。我看书从来也没有影响到工作。领导虽然没有多批评我，但还是有一些让我感到很不舒服的地方。1971年夏，周恩来总理陪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到南京访问，我工作的那个单位在市中心临着大街，虽然我当时只有17岁，我就不能参加革命群众在马路上的欢迎行列，而是把我和资本家，小业主，“国民党反动军官”一齐集中在小房间里，让我读报纸给他们听。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到南京来访问，我也不能作为“革命青年”去参加欢迎，可每一次公审反革命的大会都要我去参加，我觉得不公

平，以后就请病假。

在那个时代，政治和日常生活是交融在一起的，可是即便在那时，也无法完全实现政治对日常生活空间的彻底的占领（所以才有张春桥那篇“宏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革后期，我认识一位非常善良的南大外文系的俄裔教授刘妮娜和她的先生，在六十年代初苏侨纷纷回国之际，刘妮娜选择和丈夫、孩子留在中国。我去看望她的时候，她都会拿出漂亮的俄罗斯茶具，请我喝茶。我们从不谈政治，俄苏文学是我们的话题，从托尔斯泰、普希金、屠格涅夫、莱蒙托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到涅克拉索夫的《在俄罗斯谁能欢乐而自由》；从高尔基、爱伦堡、法捷耶夫、特瓦尔多夫斯基，到萧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我到今天还保留了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小开本的小说），在她温暖的家里，我忘记了现实世界，沉浸在俄罗斯文学的河流里，那种温馨的气氛至今还留存在我的脑海里。

受到时代氛围的深刻的影响，一个出身不好的普通工人，关心的都是自己不应去关心的事情。在我的头脑中，共产革命的理想主义，俄苏文学的人道主义、“灰皮书”的批判主义、孟德斯鸠的自由共和思想和当下正肆虐横行的“四人帮”的极左专制主义，彼此交错冲突，而它的交汇点就是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我难过得留下眼泪，一个人几次去梅园新村周恩来办公处旧址去感受南京百姓对周总理的哀悼。1976年9月9日下午，我和同事们去区里开大会，到了后又通知我们回单位去听重要广播，大家纷纷议论，多说是中苏大战打起来了，下午四点，收音机和新街口的大喇叭广播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新闻，行人神情平静，驻足聆听，却没有天崩地裂的感觉，我知道，中国的一页已翻了过去。

就这样走进我的1978年，走入我的大学年代，苏联诗人叶夫图申科说他和他的朋友是“二十大的产儿”，那么，1977，1978，1979，这三届大学生也可以称为“三中全会的产儿”，这一代人和祖国的改革开放一起成长，也见证了这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

1978年后，除去两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算起来也有四分之一的世纪了。我的研究的兴趣集中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先是参加做集体研究项目，以后决定走自己的路。这条路是颇为艰辛的，发表文章的空间很小，但是生逢历史的转折年代，还是顺着自己的性情，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从民国史，共产革命史，再延伸到当代史，这都是距今不远的过去的历史。

二十世纪的前半期，中国的史学家多研究古代史，许多历史学研究者不认为近现代史是“历史学”。六十余年前，法国遭德国法西斯入侵，年鉴学派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满怀忧伤，开始着手写他的那本杰出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他说，在他年轻时，他的高中老师曾对学生说过这样一番话：“183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一切都是政治学。”布洛赫说，又过去许多年，人们还是说：“自1904年或194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马克·布洛赫所说的上述看法，中外皆然，曹聚仁也有言，“二十年内无历史”。如果站在一个长时段的角度来审视，这些话都不无道理，距今较近，治史者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写出“信史”的难度确实很大，况且对距当下不甚远的过去，史家也需要一个沉淀思考的过程，所以我一般把自己研究的时限放在四、五十年前或更久远的过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文章合为时而著”，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又都是相对的时间的概念，它们构成了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历史之流，治史者感时阅世，青灯黄卷，上下探究，所得所获，用一定的规范和格式表达出来，即所谓“历史学”或“历史编纂学”。归根到底，历史学终究去不了叙述者的主观性，所以历史学乃人文学，非“社会科学”也。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时代的任何一本史书，都只能是一家之言，完全真实的历史可能永远无法还原。米歇尔·福柯说过，“大写的历史的确是我们记忆之最博学、最警醒、最活跃、并且无疑是最拥挤的区域；大写的历史同样是一个深底：所有存在物都是从这个深底开始存在，并且不确定地闪烁。”就笔者而言，本文集所收的这些文章都留有自己

“闪烁记忆”的印记，正是个体生命和历史的交融，才使我写下了这些文章。我所希望自己的，就是尽量约束主观性，力求做到客观，尽最大的努力去追寻那段真实的历史，而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所能做的其实十分有限，也就是把过往的历史现象当成研究的对象，去叙述、分析它的生成和演化的过程，并提供一些个人的见解。我常想，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属于过渡年代里过渡性的那类人，在我们的前面，有群星闪烁的先哲前辈，在我们的后面将会有更多受过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训练的青年才俊，也许未来张力一旦消失，我的这些文章就可归类于“历史考古学”了，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宿命，也是我的宿命，我会继续走下去。

是为序。

□ 转自高华博客

~~~~~  
【往事如烟】

文革期间的大学毕业生分配

• 石福庆 •

1966文化革命开始，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工作也同时停止。1966年、1967年、1968年的三届毕业生都滞留学校。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有三十多岁，最小的也有二十三、四岁。这么大的年龄不能参加工作，还需要家庭继续供养，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毕业生们不得不“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分配”自己的工作。我是在清华主动承担这项工作的毕业生之一，现在回忆这段事情的经过。

◇ 我贴出了要求分配的大字报

我们1960年考上清华大学，学制六年，按正常情况应该于1966年毕业分配工作。但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一律留校参加运动。开始我们是比较积极参加这场运动。半年多时间过去了，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二校门被高干子弟为骨干的红卫兵推倒了，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了，在清华召开了30万人对王光美的批斗会，罗瑞卿被装在箩筐里抬到清华大礼堂挨批斗……清华党委成了“黑帮”，整“黑帮”的工作组又因“执行了错误路线”撤离了学校。整个大学由红卫兵组织自己管理。但不久，清华学生红卫兵组织又分成了对立的两派。一派是清华大学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简称“团”派）；另一派是清华大学红卫兵井冈山“4·14”兵团（简称“四一四”派）。两派天天用毛主席语录打派仗，以致后来发生百日大武斗。毕业班的学生有一定的思考能力，对文革的有些事不理解，特别是对两派斗争很厌烦，还怕这样拖下去丢了专业，都迫切希望早一点奔赴工作岗位。

大概在1967年的春天，我在团派总部（航空馆）的墙上给团派负责人贴了一张大字报，希望他们关心我们66届毕业的毕业分配问题。我是四一四派的，为什么贴在团派总部呢？因当时中央领导对清华团派比较重视，蒯大富经常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林彪、江青、陈伯达和一些中央领导的接见。可以说，当时团派是清华掌权的，四一四是在野的。

◇ 66届毕业生串联会

我的大字报贴出后，除个别有不同意见外，多数人支持我，有本系，外系，甚至有外校的，都来找我讨论。为了发动更多的人参与，我先组织了清华大学66届毕业生串联会，后来又组

组织了北京市66届高校毕业生串联会和全国66届高校毕业生串联会。串联会的宗旨是为争取66届大学毕业生能早点毕业分配工作。串联会的活动是向清华大学人事处学生科的老师、向北京市文教组的张琳、杜志彬（他们文革前都是具体负责高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请教。还学习文革前中央关于高等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有关的文件，了解毕业分配是怎么一回事，毕业分配的程序是什么。

在请教学习的基础上，给周恩来总理、中央文革和北京市有关部门写报告，反映同学们迫切希望毕业分配，早日到工农兵中去的愿望。我们还找了高教部副部长段洛夫和国家计委副主任高云屏等，反映我们的意见。后来又写了如何进行毕业分配的建议。毕业生串联会的办公地点在清华大学强斋二楼南头一个小房间，地方不大但开个会、碰个头还是方便多了。串联会在清华大学、教育部红星楼等处开过几次会。参加这些活动的除了北京一些高校66届毕业生外，还有来自天津、上海、杭州等地的学生。

◇ 一次关键的会议

1967年8月上旬的一天，记不清是由蒯大富还是由北京市杜志彬同志通知我，让我找5—6位北京高校的1966届毕业生代表，第二天上午9点在台基厂市府大楼开会。我连夜通知了5位毕业生（清华2位，北航、北大、钢院各一位，他们都是毕业生串联会的积极分子）。第二天8点半我们到了台基厂，一进会议室，见到在座的有蒯大富、聂元梓，还有张琳、杜志彬等。蒯大富向我们一一作了介绍：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聂元梓，“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地院东方红公社”的王大宾，“北师大井冈山公社”的谭厚兰（他们几人与蒯大富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他们当时被称为革命造反派“五大领袖”。蒯大富也向他们介绍了我。快9点了，又进来两位，蒯大富介绍他们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组长丁国钰，另一位是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副组长李冠英。九点会议开始，由李冠英同志主持，他讲今天请大家来开会商量66届高校毕业生分配的事，下面请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丁国钰同志讲话。丁国钰说，你们66届高校毕业生的要求中央已经知道，你们写的材料我们也看到了。中央对66届高校毕业生的分配问题是很关心的。聂元梓同志今天也来了，她对你们分配问题也很关心。今天“五大领袖”都来了，北京市管分配的同志也来了，就是支持你们的要求。丁国钰又讲现在情况下如何分配。我们听了非常激动，我们分配有希望了，我们的奋斗终于有了结果。

◇ 组建清华大学毕业生分配机构

台基厂会议以后，我们知道中央同意我们66届毕业生可以着手分配了。我们从杜志彬那儿已经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联合发的文件《关于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中央这个文件对全国的毕业生分配都会起作用，这是我们奋斗的结果。跨校的毕业生串联会就完成了历史使命，我们就开始做清华大学自己的分配工作。

我们首先组织负责毕业分配的工作机构。当时校、系两级的领导，甚至到教研组的领导，都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红卫兵又分成两派，相互打派仗。这个时候怎么组建清华大学毕业生分配机构呢？我向清华的老干部如学生科苗既英等，向北京市负责毕业生分配的张琳、杜志彬请教。杜志彬同志还借给我一本1964年8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学生管理司汇编的《高等学校毕业生调配工作手册》，我看了这个手册，对学校分配机构有所了解，对学校分配机构的大概模式有了想法。我提议，校一级、系一级和各专业教研室都要成立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各级分配领导小组的成员是对等原则，即一名团派，一名四派。学校一级和系一级都是由两派各推一名革命干部，一名革命教师，一名红卫兵，而教研组一级，各派出一名教师和一名红卫兵。

我将这个想法，向有关老师征求意见，经他们同意后，我就去找两派的头头，“四一四”找的是孙怒涛，“团派”找的蒯大富和鲍长康。请他们通知各派选拔一名干部、一名教师和一名红卫兵代表×月×日下午4点到旧电馆211（是力学系的会议室）开会。第一次“4·14”的准时到了，团派的迟到了约半小时，会没有开成。第二次团派准时到了，而“4·14”的迟到了约20分钟，会也没有开成。我急了，再次去找两派的头头，让他们再通知一定要准时到。第三次两派都基本准时到了，还是在旧电馆211开会。这个会我将预先想好的方案，向大家讲一下，似乎大家没有什么意见。我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成立各分配小组。并强调有关毕业生分配的事情不准带回派里研究，一定要在分配小组里商量。

分配小组虽然由两派的干部老师和同学组成，但大家对毕业生分配工作都是抱着积极负责的态度，不讲派性，工作中合作配合得很好，工作非常认真。他们冒着武斗的战火坚持工作。这使我们清华大学66届毕业生分配工作比较顺利。

◇ 走出学校当工人

1966届毕业生的分配方案，在1965年国家计委联同中央、省市有关部门确定，经中央批准已经下达到各高校和用人单位。清华大学1966届毕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约2400多人。在正式启动分配后，总的来讲分配工作时比较顺利，到1967年10月底大部分毕业生已落实分配工作单位。

1967年10月28日上午，清华大学1966届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举行了毕业分配誓师大会。在清华大学大礼堂那半圆形的天穹下，回荡着“文革”以来少有的真诚而庄严的声浪。两千多名热血沸腾的青年人在这里宣誓：

我们坚决响应毛席的伟大号召，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和工农结合在一起，沾一身油污，滚一身泥巴，把自己改造成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代新人！

这一段誓词尽管带有时代的痕迹，但的确是发自内心的真诚。

大礼堂的誓师大会以后，同学们陆续地走出了校门：

水利系胡锦涛从这里走出来了。他本来是1965届的。因他是政治辅导员，延迟离校，也和1966届同时走出了清华园，走向了甘肃刘家峡工程局，成为一名水电建设工人；

无线电系的吴邦国从这里走出来了，他从这里走向上海电子管三厂，成为车间里的一名运输工；

动农系的吴官正从这里走出来了。他是1965年本科毕业后留校当研究生，他从这里走向武汉市葛店化工厂，在车间当了一名仪表操作工；

从清华大学校门，走出了2300多名年青人，其中有108名研究生。他们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忐忑不安，走向了工厂、农村、建设工地……他们拿到的“派遣证”的“职务”栏上，写的都是两个字：工人。

清华，清华，这个工程师的摇篮，摇来摇去，却摇出来了一批工人！当时，工人这个称呼比技术员光彩得多。走出校门以后，他们脚踏实地地从普通工人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在各自

的岗位上做出了成绩。多数人在企业、在科研岗位上做出了贡献。也有一部分人因机遇、性格、能力、人品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

◇ 一批分不出去的毕业生

多数同学走出校门以后，还是有200多人的分配一直没有落实，也就是说没有接收他们的单位，需要再等待着分配。分不出去的毕业生有以下几种情况：

很大一部分是干部子弟，原来他们是都可以分到如二机部至七机部等国家机要部门，而那时他们成了“走资派”、“黑帮”的子弟，那些单位不可能再接收他们。

有一部分是文革中发现有海外关系或家庭出身由“红五类”变为“黑五类”，也没有资格去国家的机要单位。

李黎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66届毕业生，原计划分配在二机部绝密单位，因受其父亲李井泉的牵连而被“待分配”，由学校重新联系他的接收单位。他于1968年11月去青海省电动工具厂报到。

桑尔侠：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66届毕业生，原计划分配在二机部绝密单位，因受其岳父龚子荣的牵连而“待分配”，经多方联系，重新分配到辽宁省。他于1968年10月27日到辽宁鹤岗133师部队报到，在北大荒部队农场劳动一年，1969年底分配到沈阳市精密仪表厂当工人。

刘涛，刘少奇之女。清华大学自控系自903班学生。对刘涛的毕业分配问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校方有明确指示：刘涛的工作不能留在北京，但又要分配在离北京很近的单位，能随叫随到。经过分配小组的努力联系，最后落实刘涛的接收单位是北京铁路局承德机务段。

还有按1965年所确定的分配方案中有180名留校当教师或担任其他工作的名额，当时老师是“臭老九”，大家都不愿意当老师。更是由于在学校两派武斗，文攻武卫，大家都很厌恶这个环境，希望早一点逃脱这“苦海”。许多人不愿意留校，最后只有四十多人留校。也就是说，有近140个本来是留校的同学，要重新确定分配方案。

大部分同学已离校奔赴工作岗位，而待分配的同学现在还走不了，他们十分着急。但要解决他们的分配问题，关键是要落实他们的分配方案，要有接受他们工作的单位。前面说过我们66届分配方案早在1965年就确定了。确定高校毕业生的分配方案不是一件小事情，是要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牵头，连同高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到第八机械工业部，还有其他部委和地方政府等部门，经过多次会议商定。对于一个学校有那么多的再待分配学生，困难很大。经过与国家计委、高教部及北京市分配办公室多次协商，我们学校提出了一个办法：分配方案还应该由国家计委下达到接受单位（或接受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而这些接受单位由我们自己来跑。于是我们分配小组决定发动各系各教研组负责分配的老师帮助去找接受单位，同时也发动待分配同学自己根据所学专业，到自己老家或有关单位去找愿意接受他的单位（一个同学跑1至2个单位），跑来的结果报到系分配小组，由校分配小组集中统一报到国家计委，再由国家计委下达到接受单位。由于各方面的支持，这些待分配的同学也先后走上了工作岗位。

□ 《炎黄春秋》 2009年第7期

~~~~~

#### 【文献资料】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  
(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编者按：这份资料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的简报”，成为毛泽东同陈伯达、“林彪集团”摊牌的导火线，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性文件。)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华北组二十四日上、下午讨论了林副主席极其重要的讲话。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出席了下午的小组会，都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另有简报)。

刘锡昌、郑维山、郭玉峰、聂元梓、刘子厚、马福全、钱学森、邝任农、吴涛、吴忠、尤太忠、彭绍辉等十二位同志发了言。陈毅同志也发了言。

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用得好，在每个关键时刻，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最好、最正确，这种态度，代表了我们的愿望，代表了全党的愿望，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代表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心愿。使我们很感动，很激动，很触动，是个极大的督促，极大的鞭策，极大的教育。大家表示要坚决按照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刘子厚同志说，学习林副主席讲话，使自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感到更亲。过去学习毛主席思想就是学得不好，就是有迷迷糊糊的思想，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今后自己要警惕，一定要努力学好毛泽东思想，改造好自己的世界观。

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为了反击这种反革命阴谋活动，钱学森同志首先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志进一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大家认为，不能让妄图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主席的阴谋得逞，不能把减少毛主席接待外宾的事务工作作为借口，实际上现在绝大多数外宾，毛主席都接见了，几乎到中国的外宾是毛主席不见不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不是一样在接见外宾吗！

马福全同志说：我们河北省广大群众在讨论宪法时，一致认为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只有林副主席，才能百分之百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我代表河北省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要求宪法上写上。

~~~~~  
【史海钩沉】

一，毛泽东如何得知林立果的暗杀计划？

很多人都发现，毛泽东在南巡过程中突然由华东回到北京，仿佛对林立果等人的阴谋洞如观火，其实答案并不难找到，国内的互动百科在“谢静宜”词条中毫不隐讳地指出：

“到1971年八月时，毛对林彪的不信任达到了极点。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谢静宜的丈夫小苏（注：苏延勋）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通过谢传来消息：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包括“联合舰队”、“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小苏要毛注意。毛决心南巡，乘南巡的机会和大军区的领导人及省的领导人打招呼。九月，发生“九·一三事件”，林彪派系被清除，谢静宜为毛立了功。”

另有关于谢静宜的文章则指出：

“应该说，在“九·一三”事件中，谢静宜和她的丈夫是立了功的。谢静宜的丈夫叫苏元勋，在空军机关机要部门工作。1971年毛泽东南巡期间，苏元勋凭着职业的敏感，感到了空军的异常。毛的专列在杭州时，苏元勋将有关军队异样的情况透露给了谢静宜，谢静宜直接将情况用保密电话告诉了毛的护士长吴旭君。吴旭君立即告诉了毛泽东。引起了毛的高度警惕。所以，在杭州、上海期间，毛泽东对王维国等空四军的人已经是精警防范，不让他们近身了。——不能说毛的信息全来自谢静宜一人，但在关键的时刻，她所提供的这些情报，于毛而言，无疑是极其重要的。”

毛泽东晚年最信任的人之一的机要秘书“小谢”谢静宜的丈夫苏延勋，被安插在林立果最核心的“空军党委办公室”当卧底，还能提供最核心机密，林立果的一举一动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呢？在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情况下，最重要的不是保密，而是时间和实力。倒是毛身边看似不起眼的小人物的作用颇堪玩味。汪东兴在《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所说的：“所有这些，毛主席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只能是闭目塞听，或者只能说明他自己不知道，因为汪东兴在同书中很快又说，“但毛主席没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如果毛真的“都不知道”，还谈什么“斗争”呢？

二，“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1971年9月4日，汪东兴将他和华国锋追记、经毛泽东改过的南巡谈话稿（8月16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湖北、河南、湖南等负责人的谈话）专送周恩来。主要内容讲述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揭露黄吴叶李邱以及背后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分裂党、急于夺权的阴谋。9月11日，周恩来和回到北京的华国锋谈话，更是完全了解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据李伟信（上海空4军政治部副处长）供词，9月11日22时，得知毛泽东已经离沪北上。他们开会的房门打开着，李伟信到门口一看，室内气氛异样，刚才那种嚣张气焰已被神色茫然所代替。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空司一处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副处长）几个人目光滞呆，低头不语。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

1971年9月12日13时10分，毛泽东的专列秘密停靠在北京丰台车站。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非常吃惊，怎么不声不响就回来了？原来计划不是这样的呀？周恩来

的卫士长高振普回忆，9月12日17时，总理起床，睡够了6小时，特别精神。一直等候的杨德中（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跟着总理进了卫生间，报告主席回来了。总理问，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丰台（知道毛泽东离开上海）？杨德中说，除了加水，一路上基本没停。总理又问，专列什么时候进的北京？杨德中说还不清楚。已经到了北京，毛泽东当然不着急了。他让汪东兴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李德生（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北京军区第三政委）、吴德（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到丰台车站等候（据张耀祠回忆，毛泽东是在天津站时叫他打的这个电话）9月12日13点10分，毛主席的专列驶抵丰台。车停好后，毛主席在车厢里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谈话，一直谈到下午3点多钟。这次谈话，汪东兴也参加了。

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央警卫团团团长张耀祠这个人物。张耀祠说过：“我的职责是保卫毛泽东，保卫中共中央，负责安排毛泽东的衣、食、住、行。”他就住在毛泽东卧室咫尺之遥的更衣室，与毛泽东朝夕相处。从张耀祠打电话通知纪登奎吴德等人就可以发现，以“打电话”方式直接传达毛泽东旨意的人，往往就是张耀祠。

网上还有记叙称，“15时10分左右，将军楼车库开出一辆伏尔加，老王清楚地看见里面坐着三个人。司机是周宇驰，旁边是于新野，后座坐着林立果，一个个神情紧张……从这段目击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15时毛泽东还在丰台车站谈话时，已经有人把消息透露给了林立果。所以他急急忙忙到西郊机场策划“第二套方案”。16时30分左右，胡萍（空军副参谋长、34师党委书记）接到周宇驰安排南飞机群的电话，18时刚过，256机组接到飞往北戴河的命令。专列12日16时零5分抵达北京站，从来没有白天在北京站下车的毛泽东坐汽车回到中南海。9月12日19点40分。林立果乘256号从北京飞山海关，20点15分到达。”

既然连周恩来都不知道毛泽东突然回京的消息，林立果怎么可能在毛泽东还在丰台谈话的时候就已知毛要回京？这再次证明保密不过一种因人而异的游戏，而转递消息的渠道可能正是张耀祠，也可能就是通过吴旭君，谢静宜，苏延勋这条线。既然苏延勋可以把林立果政变消息密报毛泽东，自然也可以在毛本人的授意下，把毛的行踪又反过来故意让林立果知道，以刺激林立果的进一步动作。既然没有人因泄密而被追究，可见是故意而为。不仅如此，毛对于林立果“劫持”256号飞机的举动，始终不加以有效阻截，甚至还让揭发林立果的林立衡也上飞机。林立衡的回忆中说，“11点30分，我责问张宏：‘两小时以前我就对你说好了，你为什么还不动调部队，你快带部队，快上！’张宏一声不吭，我反覆问他：‘到底是谁让我们跟着上飞机的？’他说：‘中央。’”熟悉党史的人都知道，“中央”绝不是一个集体名词，而是“毛泽东”的另一种说法，如，任何文件，未经中央批准则如何如何这类语言，就是说未经毛泽东首肯。并且如林立衡所说，“林彪就是中央首长”，那除了毛泽东，还有谁敢于在林彪面前自称中央呢？在林立衡的回忆中，同样提到，向张宏下令的人，正是张耀祠。

毛泽东敢于不阻拦林彪和林立果的飞机，放胆让他们上天，决不是因为他大度，从毛泽东对自己个人安全的极端敏感来看，当他已经从苏延勋或其他渠道获知林立果的政变图谋，则必须置对方于死地是毫无疑问的。回顾毛的政治斗争历程，凡是和毛作对过的政敌，无非三种下场：一，忍受不了冷落和羞辱，自行离去，如张国焘和王明；二，想离去也不行，必须斗死；三，反复检讨唾面自干以换取生存，如周恩来。但林彪一家的情形不同，因为前三种情况都没有直接谋害毛的企图毛尚且不依不饶，一旦知道林立果的具体计划，毛怎么可能还让他们随意乱飞，一旦携带大量机密安全出境，其政治后果将是可想而知的。但另一方面，解决林彪一家（之所以说一家，因为林彪本人是否参与林立果的图谋，至少在毛眼里是不重要的，文革不就是一个政治人物家庭间的斗争史吗？）的问题，也和前面的情形不同。比如刘少奇，从毛在1965年左右做出决定，刘必须下台，到1969年正式开除其党籍，经历了四年之久，不论

毛是何等专断，他也得小心翼翼，步步为营，从剪除羽翼，群众批判，到专案组调查，到九大举手表决，至少程序上还像个样子。这尚且是在刘少奇既不拥有军权，又没有任何实质反毛行动的情况下，而以林彪在军队的影响力，在林立果的活动已经威胁到毛的安全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可能再用政治解决的办法对付林彪，必须“出奇兵”，不择手段地迅速了结。的确如林彪所说，毛是一旦得罪人就要得罪到底的。用刘吉纯的话说，“如果中央早下命令，林彪他们是跑不了的”。但“中央”却就是不下令拦截，或者随便找个借口说飞机不能起飞，偏偏让飞机顺利起飞，只能说明，毛对飞机飞走后的结局是预料到的，甚至早就在通盘考虑之中。在一切正常的情况下，林彪的专机坠毁的机率是极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毛泽东真的敢于面对林彪流亡海外的政治后果吗？如果毛对自己的安全那么在意，却对林彪携带国家机密出境那么大度，这岂不是说，他把自身安危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三，飞机的起飞和爆炸

问题就在于，飞机不是在正常情况下起飞的。9月12日夜里11点40左右，周恩来和叶群通了一次电话，谁先给谁打电话，姑且存疑。按汪东兴和林立衡的回忆，都是叶群给周打电话，重要的是，周恩来在对话中说：“晚上飞行不安全”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周恩来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

最蹊跷的是，周恩来在叶群已经表态白天飞后，还劝阻不要飞，说不安全。有什么理由呢？秋高气爽的九月，“气象情况”怎么突然变得那么重要？说了两次“不安全”，是否说明，周恩来对于飞机本身的安全不放心？作为“侥幸”逃脱了“克什米尔”号空难的老政治家周恩来，应该不难想到，在飞机上做手脚是一种很有效而且可能的做法。因此他的话，可以看作是一种善意的提醒，但是更多的就无法再说了。而叶群在这样一个紧急关头还在给周恩来打电话，本身也说明，林彪和叶群对周恩来是信任的，即便他们要另立中央，难道就不需要争取周恩来这样一个能臣？况且周在历史上倒戈也不止一次！在此，我们的假定可以是，毛泽东反制林彪的种种手段，很多也是瞒着周恩来的，因为在毛的眼里，周恩来和林彪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他不可能是一个得力制裁林家的人。我们甚至可以推断出，毛泽东在文革中后期对待人的态度的试金石，就是与林彪的关系，在毛看来，对倒林起了大作用的人，大到张春桥，小到谢静宜，都是他绝对信任的，而倒向林彪的人，如陈伯达，则非除掉不可，对周恩来的待遇则用“批林批孔（周）”来敲打，实质上对林和周是一勺烩的。甚至汪东兴这个人，当时也没有得到毛的绝对信任。

一篇题名为《周恩来紧急部署：林彪座机坠毁前后的空军指挥所》的文章中说：“13日零时刚过，周恩来把李德生叫到电话间，说林彪要乘飞机逃跑，要他立即赶到空军指挥所，24小时不要离开。”而康廷梓的回忆表明：12点05分，潘景寅接了个电话，就命令那个调度室主任，马上给山海关车站要油车，开始给飞机加油，马上要油车。然后潘景寅出来，就把三个机械师叫起床，康廷梓就睡在隔壁，但却一点儿动静都没听到。按《吴法宪回忆录》的说法，吴法宪曾直接打电话给潘景寅，命令潘“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而潘景寅在电话中也满口答应。但是飞机还是在潘景寅的驾驶下升空了。通常人们强调海军政委李作鹏篡改总理指示，放飞256号，但是须知，即便李作鹏能命令属于海军管理的机场，也命令不了属于空军部队的潘景寅。潘为何敢于违抗空军司令的命令？没有一个回忆明确指出，12点05分的电话来自谁，谁能在空军司令都已经下令停飞的情况下，在周恩来已经确认林彪要逃跑的情况下，还命令空军干部潘景寅起飞？从时间来看，林彪一家12点22分地抵达机场，而机场距离林彪北戴河驻地40公里（康廷梓的说法），即便司机以100公里时速狂奔，12点时林家无论如何也已经在车上，除非林立果有手机，否则根本不可能在车内电话联系潘景寅。

康廷梓的回忆中一再说明，潘景寅当晚的举动十分诡秘，“潘景寅巧妙地策划着机组走留的分解局面，做得那样精心、准确，滴水不漏”，他把绝对不可缺少的副驾驶刻意用下的。康廷梓的回忆还表明，在林彪一家12点30分左右已经登上了飞机之后，机场才正式“接到不准起飞的命令”，开始拦阻飞机。那么，从12点正到12点30这半小时之内，既然周恩来已经明知林彪要叛逃，拦阻的具体实施为什么迟迟不能切实执行？更何况，假定潘景寅和康廷梓一样睡觉以按原计划早晨飞行，或者没有12点05分的命令他备机，那么等到林彪到达的时候临时找潘，他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飞机飞起来，而只能坐待12点30分那个“不准起飞的命令”和8341部队的到来。难道还不能推断出，这个放飞命令和要林立衡上飞机的命令一样来自“中央”，而打电话的人可能就是命令张宏不得拦阻林彪车队的张耀祠？当时情形似乎是：12点林彪一出门，张宏就立即告知张耀祠，而张耀祠在请示毛泽东之后于12点05分打电话通知潘景寅准备起飞，而且这个命令中包括不带副驾驶这个致命的一条。如果“绝对忠于毛主席”是一切行动的前提，而这个电话就来自张耀祠（毛主席），潘景寅执行命令就是顺理成章的。康廷梓的回忆还指出，“当晚，潘景寅在为他单独安排的房间里只呆了不足5分钟。除了开机组会之外，他基本上就在调度室主任的房间。除了接听电话外，就和当晚同机到山海关的程洪珍聊天。他们谈一些三叉戟飞机性能方面的问题。在调度室主任的桌子上有3部电话机，其中一部是红色的，一部是山海关机场内部的。按规定，红机电话都是直接与重要人物联系用的。”这表明，潘景寅在起飞前和“重要人物”保持着直接联系，而红色电话机正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联系和指示下属时用的。假如没有“重要人物”的批准，潘绝对不可能敢于把飞机飞出境外。潘的飞行任务是涉及林彪的，还有谁是比林彪更“重要”的“人物”呢？这样，不论是吴法宪还是周恩来向潘景寅喊话都无济于事，因为潘的行动已经不再受他们辖制。

还必须注意的是，按照康廷梓的说法：“按规定专机过夜停放时，必须交当地警卫部门看管。所以，机械师围绕飞机再次对过夜停放应做的工作检查无误后，准备移交给山海关机场场站的保卫部门。”而山海关机场属于海军管理。有没有可能，正是在这段时间内，飞机已经被机场保卫部门的人做了手脚？康廷梓还回忆说，“然而，有一点我是在脑子里转了一个圈的，即在当晚的乘机者中，除刘沛丰、林立果两个人乘车离开机场之外，还有谁离开了呢？在另外的三个人中，起码可以断定这两位女兵没有离开。但也许已经走了，又想起什么东西忘在飞机上，为了取东西又回来一趟。”这至少说明，两名女兵就可以任意接近和上下飞机。

一篇题为《看周宇驰人生的最后结局》在提到被劫持的直升飞机和飞行员陈修文的时候，有这样一段文字：

“当时，中苏关系仍然紧张，飞行员严把空中防线的教育使飞行员对类似空中叛逃的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性与敏感性，不但所有空勤人员的航行资料包里不准携带境外的任何资料，更没有境外的地图，平时飞行中如果在国境线附近遇到雷雨天气，宁可向国内方向绕飞50公里，也不能向境外方向偏出1公里。所以，在那个年代里，由于飞行员有着坚定不移的防范意识，很少听说有飞机被劫持到国外的。当陈士印和陈修文断定周宇驰是在劫机外逃时，立刻从思想上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一边飞行，一边考虑着应付的措施。”

难道潘景寅对于飞出国境就没有一个飞行员应有的“高度的警觉性与敏感性”吗？唯一的解释就是，潘景寅遵照从红色电话机传来的命令把林彪一家飞出国境，而且故意违反三叉戟必须两人同时驾驶的规程。《周恩来紧急部署：林彪座机坠毁前后的空军指挥所》的作者还写道：“不可能？我不相信，反复问了好几遍。我是飞行员出身，吃飞行这碗饭20多年，军用运输机必须两个飞行员，只有一名飞行员就飞上天，还从来没有先例。我吓坏了，这是林彪的专机呀，怎么一个人就飞了？”关于256号飞机的违规操作，林彪的警卫员吕学文也有类似看法，“我们进入机场以后得知，这架飞机的驾驶员是航空兵某师的副政委潘景寅。由于飞机起飞得十分仓促，油未加，副驾驶员和报务员也未来得及上飞机，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讯保障的

情况下，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了。原来说飞往广州，现在是向北飞去，到底飞往何处就不清楚了。当时副驾驶他们就下结论说：这架飞机完了，上去的人，上去就下不来了。他们的依据是：第一，三叉戟降落时，必须正、副驾驶员一起操作，正驾驶操纵整个机体，副驾驶放下“脚架”，以保证飞机降落时机体的平衡，才能确保飞机安全。但现只有正驾驶，飞机降落时无法放下脚架，着地时无法保证机身的左右平衡，不是损坏机身，就是引起油箱着火、飞机爆炸。第二，如果飞机出了国境，因没有报务员，不能与他国机场联系，非被人家当敌机击落不可。”显然，这架飞机一起飞就绝无生还的可能，不论是在油箱作了手脚，还是由上飞机的司机伺机而动，还是最后带油在无法放下起落架的情况下自行坠毁，潘景寅们的任务就是决不让这架飞机上的人活着落地。而他们自己，则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潘景寅既然有时间叫机械师，就有时间叫更重要的副驾驶，而不带副驾驶的命令，绝不是象康廷梓所说的那样来自林立果。试问，林立果以什么身份命令一位空军副师长？又怎么可能说不带副驾驶，从而下一个会杀死自己的命令？就算林立果下了这样的命令，潘景寅会冒着机毁人亡的危险去执行吗？邓小平说，按他“个人的看法”，潘景寅“是个好人”，可是，邓小平并没有参加有关调查，也大概不认识潘景寅，却能认为这个严重违背军令擅自越境，且违背操作规程的飞行员是“好人”，若不是掌握了最核心的机密，邓小平何出此言，以他的身份，哪有可能公开表达什么“个人的看法”？只能说，这是对于因执行秘密任务而牺牲自己的军人的一种委婉地肯定。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小人物是林彪的司机杨振刚。即便李文普真的因为林彪问了一句“伊尔库茨克多远”就急忙跳车，司机杨振刚何以听了之后仍然毫不犹豫地一路过关斩将，以100公里的时速把林家送上飞机？不仅如此，杨振刚自己也上了飞机？张宁在《自己写自己》中有一段最耐人寻味的话：“张宁说，林彪专车司机杨振刚，9月10—11日两天，李文普找他谈话后，情绪陡变，从不喝酒的人却喝得醉醺醺的，直到12日深夜开车载着林彪等人进机场，一同上了飞机，死在外蒙古。”李文普否认杨振刚和事件的牵连，甚至否认杨振刚喝酒，但却无法正面回答，为什么司机需要跟随一同上飞机，而不是留在地面等待首长回来的时候接机，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他自己跳车逃跑后，而杨振刚却在后有追兵的情况下，忠心耿耿，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样看来，杨振刚酗酒和情绪低落一事很可能也是因为杨已经被交了底：送林家上飞机，随同上飞机，并伺机采取某种行动，随时献身。

最后可以确凿证明是：飞机在空中已经爆炸。现场勘察发现“出现了一个直径约30厘米的孔洞”分析认为，“一、256号三叉戟飞机上的孔洞，直径约30厘米，这不是导弹的射径；二、256号飞机上的孔洞，呈不规则形，这更不是导弹击痕；三、孔洞在机翼下面，位于“中国民航”的“航”字旁。孔洞只在机翼下面有，而在机翼上面没有。如果是导弹击中，则上下两面都要有孔洞；四，孔洞的边缘，是呈外翻状。这也证明不是导弹击中的。如果是导弹从下向上射击的，那么，孔洞的边缘应该是向里翻；如果是导弹从上向下射击的，虽然机翼下面的孔洞其边缘是向外翻的，但机翼的上面应该有边缘向里翻的孔洞，可机翼上面没有孔洞。这些存油量，还能够供飞机飞行一段时间一段距离。”有一个大洞而不是导弹击穿，内部爆炸的推论到此已经呼之欲出。而且，飞机带着大量的存油在非机场地方降落会增加爆炸的危险系数，也是飞行的大忌。这说明，潘景寅是在飞机已经出现爆炸和严重故障的情况下带着2.5吨汽油迫降，从而引发更大的爆炸。当官方把飞机尾部的空洞解释为坠毁时油箱爆炸造成时，就已经否定关于汽油不够的说法。事实上，只有在飞机已经爆炸的情况下，潘才可能（或许在林彪林立果等人的命令下）紧急带油降落，但是由于前面已经说过的违规操作，即便紧急迫降，也最终会因为缺少副驾驶而无法安全着陆。

林彪研究专家舒云在最新的博客中也把飞机被事前破坏作为一种假设：

“在256三叉戟起飞前，有两个人站在右机翼上加油。256三叉戟起飞时，油箱的油盖没有盖上。会不会有人顺手往油箱里面放一个小型的定时炸弹呢？因为256三叉戟右机翼

的大洞是出现在机翼的油箱上，所以考虑是往油箱里扔了小型定时炸弹。“克什米尔公主”号就是特务在地面把伪装成中药包的炸弹扔进油箱，造成飞机坠毁。因为小型炸弹威力不大，所以飞机能带火在空中飞行 20 多分钟，建立空中航线。又因为带火迫降，火越来越大，来不及把剩下的油耗光，只好冒险带那么多的油迫降，爆炸就在所难免了。”

按康廷梓的说法，负责加油的人就是机械师，那么为什么不能猜测，正是三个机械师受命在加油过程中已经破坏了飞机，潘景寅则往北飞一架即使不破坏也已经无法正常降落的飞机？

当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外交人员向周恩来汇报到机翼根部大洞时，说怀疑是防空导弹打的，但是洞口朝上，下面没有穿透，（注意康廷梓说过，256 油箱盖在机翼上方）而且洞口铝刺并不规则，所以难下结论，周恩来点了点头说：“这个要好好研究研究。”然而，这么重要的问题，周恩来似乎没有真正去“好好研究研究”，甚至连部分飞机残骸也是多年后由中国商人购买回国，可见有关方面对于残骸的麻木甚至刻意回避的态度。

四，谁是赢家？

纪登奎回忆说：后来当听我说到“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号啕大哭起来，其间曾几度哽咽失声。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伤心，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把周恩来少有的失态，欲言又止，和他对叶群的两次提醒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认为，在毛泽东不择手段地谋杀了林彪的过程中和之后，周恩来是怀有负疚之心的，如同他对贺龙，对陈毅都怀有负疚之心一样，但林彪的下场更加令人毛骨悚然，毛泽东既然可以使出这样的极端手段对付林彪，作为林彪之后重又成为第二号人物的周恩来，何以不担心那把悬在自己头上的利斧？有意思的是，在林彪死后的一次庆祝中，周恩来让张春桥买了一瓶茅台酒，这似乎意味着，除掉林彪，最该庆祝的人其实是张春桥这个已经被毛泽东视为下一个接班人的角色。不过，最终张春桥也成为阶下囚，真正笑到最后的大概是那个声称“林彪不死，天理难容”的人，只有他才会发自内心地认为潘景寅是个“好人”。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